

中國經典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by

JAMES LEGGE

IN FIVE VOLUMES

IV

THE SHE KING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引言

费乐仁

任何一个好的翻译者都清楚把一首诗从一国语言翻译成另一国语言是一项艰巨任务,也是翻译者追求的最有难度与最具创新的挑战。“谐韵”和“韵律”在语言里是最富有变化的,但当语言涉及如象形字的中文与基于拉丁语系的拼音语言之间的转换,那么存在的巨大差异倍增对翻译者的挑战。理雅各在 19 世纪 60 年代在处理《诗经》的英译中,就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为了再现“忠信原文且含韵律的译文”,就应当是“尽量逐字翻译”,若不能做到,结果最终只是“毫无价值”,即使它韵律多么的优美,也不是“富含诗意的优美诗歌”或者拥有“情感丰富的表达”。^①最终,理雅各在他这套古籍的第一版英译中,做出了勇敢实践^②:

我的目的是能[精确地]给出一个反映原文含义的译本,[除此以外]不增加,不随译(paraphrase),我尽量做到这点。整本文集若翻译为韵律风格,则负担太重,不值得做。但是可以让任何一位愿意从事韵律诗歌翻译的人士,根据我的译本,也许能呈现出“忠信原文且含韵律的译文”。

我们可以从理雅各关于古典诗歌英译的这个细致评论中看出,他没有反对某些人试图展现一个类似于“忠信原文且含韵律的译文”的原则,但是他知道只有译者全然地领会了古代中国诗歌的基本含义,才能达到“忠信”。否则,从事这类翻译,本质只会是徒劳。显然,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很多翻译学家赞成理雅各的观点。有一位翻译学家明确指出翻译诗歌是“(不)可能之任务”;^③然而,有些人虽然意识到这种巨大的复杂性,仍想尝试。这项“(不)可能之任务”不断挫败和激励着理雅各继续在翻译上的突破,因此,在他出版了这套非同寻常的儒教典籍诗歌的直译本后,又花了至少十年在中文诗歌的翻译上。关于理雅各在第一版《中国经典》第四卷翻译的得失,我们即

① 引自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5),第 115—116 页。

② 引自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第 116 页。

③ 引自 David Connolly 著“Poetry Translation”,载于 Mona Baker 主编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第 170—176 页,该短语请见第 171 页。

将讨论。在这之前,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在理雅各在出版第三卷(1865)和第四卷(最终完成并于1871出版)的五年间隔期间的历史背景。

甲、翻译《中国经典》第四卷的历史背景

此时离理雅各刚开始出版翻译儒教经典时,已经过去了十年。他那时过了45岁,因此原本希望用十二至十五年的时间,在1861年能完成中国主要儒家传统的古典经文《四书》与《五经》的翻译。但他的理想计划被突然出现的问题彻底改变。结果完成《五经》的最后一卷时,离他刚开始翻译已经过了二十一年;1882年,理雅各翻译的两卷《礼记》被收入他同事穆勒(1823—1900)主编的50卷系列丛书《东方圣书》,并由牛津出版,这标志着他儒教古典经文的翻译任务告终。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让理雅各的计划发生如此大的转变?首先,深深使理雅各感到不安的是他大哥的去世,他大哥 George Legge 理乔治(1801—1861)是公理会牧师和教派领导人。由于苏格兰文化和中国文化都重视孝顺,因此年轻的理雅各和他侄子一起整理他哥哥最有影响的一系列布道,或者是在传统苏格兰牧师学者中更偏爱称作“演讲”的稿子。理雅各在1863年完成出版该文集时,给其中记录了他们作为公理派不从国教的基督新教徒的家人生活的一卷,添加了一个长达100页的回忆录。^①理雅各在香港祐宁教会的布道中两次谈到他大哥的死对他的影响,因为让他想到自己也会终有一死,也许不能完成他的事业,若他不够明智和律己。事实上,同一时期,他外出两次“假期旅行”,分别于1861年和1864年到广东省的东江和西江。第二次旅行时,他与同行的人遭两次当地居民石头袭击。^②由于不顾这些事情影响到他严格的日程安排,理雅各的健康状况开始下滑。每天早晨3点起床,

^① 请参照由理雅各和理约翰合编的理乔治 Lectures on Theology, Science, and Revelation (London: Jackson, Salford and Hodder, 1863)。四个兄弟中有关大哥回忆录的页面(四兄弟中理雅各是最小的)就达到了98页。该书原来写于1862年12月30日,但是,由于搭载此书的船只沉船了,所以推迟完成。这卷包括前言(写于1863年3月)和共420页的25篇“演讲稿”的回忆录。其中所有内容都是从手写体文本转换成打字文本。尽管计划出版第二卷演讲稿,但似乎未完成,因为没有手稿遗留给后代去证实实施过程。

^② 这些成为吸引本地读者的故事。这些故事第一次被作为增刊于1861年6月3日出版在殖民地的 The China Mail 报刊中;第二次被作为单独卷册的出版就反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大众爱好。出版的所有盈利都捐给“慈善机构”。请看 Three Weeks on the West River of Canton, Compiled from the Journals of Rev. Dr. Legge, Dr. Palmer, and Mr. Tsang Kwei—Hwan (Hongkong: De Souza & Co., 1866)。

工作到7点或8点才吃早餐,然后是一整天的传教服侍工作。在凌晨靠着烛光学习,视力逐渐下降(甚至受到影响)。同时,处理混乱的《圣经》经文是项巨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注释;^①最后,他被意识到他翻译的一些章节很有可能是伪造的。^②这让理雅各不得不额外大量地思考与审查,于是他给二章添加了一些选择性翻译,甚至打印出大篇幅儒家学者的批判评论指出作品的后面部分伪造的地方。一般来说,《中国经典》第三卷的注释比任何其他四卷的注释都长。^③

与此同时,理雅各还需要面对其他来自家庭、教会与体系的困扰。一方面,他的第二任妻子,Hannah Mary Legge 理汉娜(1821—1881),很难适应中国东南的湿热气候,因此最终他们决定在1866年初,妻子与4个孩子早理雅各先回苏格兰。

在19世纪50年代末,另一方面的矛盾出现了。伦敦差遣会的秘书 Arthur Tidman 田德敏(1792—1868),开始质疑理雅各“花过多时间”在翻译《中国经典》,没有很好地侍奉。^④这对任何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尤其是像理雅各这样一位忠于职守,在上帝与其他人面前高举圣名的传教士来说,是最严重的指控。虽然这些指责后来随着田德敏在1866年退休而结束了,但它们对理雅各及了解理雅各牺牲精神的人所造成的负面情绪长达近10年。理雅各在1863年雇佣了年轻的中国学者王韬(1828—1897),参与他大量注释工作。理雅各原本计划完成《中国经典》英译,但现在却遭到差遣会的排斥。如

① 总共630页的正文通常包括三个方面:中文原本、理雅各的英译本和141页的小体字注释——其中70页都是注释,另外71页在页面上方仅仅有2或3行的中文原文;这些都意味着注释一般都占每页内容的三分之二以上。换句话说,超过百分之二十二的内容都是注释,在大多数其他页面里,也至少每页占一半。至少可以说,这是项巨大的工程。

② 当整部作品出版到一半的时候,理雅各承认相信这种情况的发生。他开始将带有中文原本的附录选择性地增加到了所有的章节当中。后来,他又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增加一段很长的中文评论文摘要关于为什么会出现伪造的经文(对理雅各来说,没有翻译成英语的摘要很不寻常)。有关包括了中文文本及其翻译的两个附录,请见理雅各1895年版《中国经典》,第三卷,第297页—299页和第318页—319页,有关中国文本揭示前面章节被当做伪造内容的原因,请见第三卷第361页、380页、433页、561页和612页。

③ 一般来说,注释至少有半页的篇幅。而在前两卷每页中,注释很少超过底部的三分之一。

④ 自理雅各1843年到1868年以在华传教士身份加入伦敦差遣会以来,田德敏曾是该协会的秘书。正是因为田德敏比理雅各年长20岁,并且理雅各传教生涯伊始就认识他,所以,这件事情影响到了两人的关系。

果他不能让英华书院出版社出版他的译作,那么将如何继续他的翻译?

在继续保持着与伦敦差遣会领导人联系的同时,理雅各在 1867 年与他的家人一起搬到苏格兰的新家。很快,在 1868 年,他安排王韬加入他们,与他们家人一起住在苏格兰的 Dollar 德拉。但在 1869 年,又出现新的转机,理雅各受邀担任以英语为主的香港祐宁教会的牧师,他曾协助该教会在 1844 年落成。由于伦敦差遣会准许理雅各在香港期间使用英华出版社,这样他首先与王韬一同回香港,他的两个大女儿也随后回港。^①

但是这并没有结束理雅各出版《中国经典》所面临的困难。原本一到香港安顿下来,就着手第四卷的出版,没料到又出现延误:载有第四卷出版用纸的船,在快到香港港口时沉没了,因此不得不等上数月,重新从欧洲运回一批高质量的印刷纸。^②

随着英华书院出版社的名字改变成“伦敦差遣会办公室”,理雅各也从最初的“传教士学者”到 1870 年成为“牧师学者”。到 1871 年末,他成功地出版了第四卷《中国经典》,包括长篇详尽的绪论,以及他为儒教经文《诗经》里 305 篇诗中,每一首诗的英译与评论。

乙、理雅各译《诗经》之复杂性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第四卷《中国经典》,虽然同其他卷一起在 1895 年于牛津出版,但实际上是 1871 年发行第一版的重版。第三卷与第五卷也同样如此,因此,有些具体问题需要强调一下。首先,这些卷里的绪论和正文都是单独排序,换言之,正文重新从页码一开始,不是按绪论一直排序下来(如前两卷修订版)。^③第二,卷中使用的音译体系是根据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的中文字典,非前两卷修订版中采用的威妥玛英译音译体系。因此,读者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拼写,有些翻译实际上是广东话的发音,而不是

① 这些所有的细节以及理雅各生平和著作的其他方面请看费乐仁著 *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4) 第二卷。

② 请见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前言 V。

③ 这样更加重要的是要强调页码是否在“绪论”中,因此若在以下的脚注中没有看到“绪论”,就表示在正文。

北方读音。^①

除了这些棘手的问题外,读者还需了解理雅各整卷正文主要采用诗节的形式呈现诗歌。理雅各先从早期儒教经文的《孟子》^②和《尚书》^③里把诗歌以诗节形式同散文区分。这样诗节就很自然地贯穿整卷主体,且更有体系。在这卷《诗经》里,每首诗按罗马数字编排,以每十年排序;每个诗节则用阿拉伯数字标记,尽量做到能准确相互参照。

最终,理雅各在他作为传教士学者或牧师学者期间(1840—1873)和汉学家——翻译者(1876—1897)时期,共4次出版《诗经》,并呈现出3个不同译本。我们现在的这册最初在1871年香港出版,随后于1895年牛津再版;称为“现代版韵律译文”的第二版与其他卷一起于1876年在伦敦出版。1879年发行的第三个译本收录于《东方圣书》系列丛书里《中国圣书》第一卷,它重新编排和选摘了只涉及“宗教范畴”的诗篇,不以前两版中采用的诗节或诗歌元素的形式呈现。虽然关于这三个不同译本间的差异不将做重点讨论,但对之感兴趣的读者欢迎参考此方面的其他学术研究。^④

丙、理雅各译《中国经典》第四卷之成就

对于那些已经阅读过理雅各其他三卷的读者来说,面对详尽的“绪论”,已不再陌生。为了达到学术性与完整性,理雅各不但介绍《诗经》的历史渊源

① 例如,宋代学者欧阳修(1007—1072)的英文译名是“Gow—yang Sēw”,这个名字实际上与广东读音 Ngau—Yeung Siu 接近,特别是第一个和第三个汉字的音译。同样,两位汉代学者英文译名“Ma Yung”和“Ching K'ang—shing”应该和 Mǎ Róng 马融(79—166)和 Zhèng Kāngchéng 郑康成或 Zhèng Xuān 郑玄(127—200)的读音有关联,每个名字的最后汉字英译都受到了粤语读音的影响。遗憾的是,宋代儒家学者朱熹(1130—1200)和清代主要编者阮元(1764—1849)这样重要的人名却被翻译成为了“Choo He”和“Yuen Yuen”。粤语读音的影响就体现在 Xi/He 和 Ruǎn/Yuen 之上。对21世纪那些不熟悉这种古老且偏颇的音译方法的大陆读者来说,很难理解这些书面译文。其实19世纪70年代早期,理雅各就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在牛津教学期间,在他往后的译作中采用威妥玛英语音译体系(同样也使用在《中国经典》首两卷的修订版中)。这些音译问题请看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2页(Gow—yang Sēw 和 Choo He)和第11页(Ma Yung 和 Ching K'ang—shing)和第172页(Yuen Yuen)。

② 例子请看《孟子》正文中包含的诗歌,请见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二卷,第289页,第297—299页,第301页,不过没有总是按《诗经》中诗歌以诗节的形式呈现。

③ 请看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三卷,第89—90页和第158—161页。

④ 请参考费乐仁著“James Legge's metrical Book of Poetry”载于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60:1 (1997),第64—85页。

及其复杂性，还增加一系列特别附录与补充翻译，让读者了解更多知识。

（一）《诗经》，理雅各之解释立场

一开始，理雅各着手这部古籍的历史时，就勾画出一个关于中国经典文化的主要问题：孔夫子与这部著作的关系是什么？仔细研读相关文学历史及其评论后，理雅各提出强烈的批判观点：^①

孔子当时的《诗经》与我们现在拥有的，编排和内容大体一致，并出现于孔圣人之前……当年的《诗经》中会遗漏诗篇，但是少许。孔子拥有一本自己的《诗经》，方便他本人及其弟子，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否定《诗经》中的任何诗篇，也没有篡改任何诗篇。

这部诗集是怎么形成的？^②

我个人认为从王室庭院到各个地方的庭院的人们日常交流的诗篇，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值得保留下来……

我们现在能肯定的基本结论是，现存的《诗经》是早期周代不同诗集的片断，以后有增添，特别是在某国的繁荣统治时期，诗歌的收录完全按照《礼记》所保留的编辑诗篇的规则……

由于质疑一系列汉代毛氏传统，因此理雅各把诗歌按年代排序显示出他如何怀疑毛茛（最早编辑《诗经》之人）关于诗歌作者超过一半的断定。在此方面，理雅各显然赞同汉代、宋代和清代学者反对毛氏早期传统的语文学与解释学的批判性研究。^③虽然他仍对这个传统学派的解释立场持怀疑态度，还是采用他们的诗节形式组织诗歌。^④理雅各更具争议的立场是同意 Twan Yuh—tsae [段玉裁 1735—1815] 反对 Koo Yen—woo [顾炎武 1613—1682] 及其他人的观点，认为古代周代文化中，人们说的语言必须有三个重要的语调，而非无声调语言。^⑤一般来说，相比其他语文学资料，理雅各更多依赖于语文习惯用语的《康熙字典》，因此，也造成他忽略一些 19 世纪清代学

① 引自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 5—6 页。

② 随后的引文出自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 25 和第 27 页。

③ 在仔细地修订各个年代的诗及其描述后，人们发现理雅各只接受了毛氏鉴定的 146 首诗的作者，质疑其中的 163 首作者名，重新界定了 3 首诗的作者。这也就表明他持怀疑和学术的立场：虽然他对大多数持怀疑态度，但是他并不会给已有的言论提出任何新的证据以提供正确的选择。请见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 82—86 页。

④ 请看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 97 页，第 25 页和第 27 页。

⑤ 请看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 102 页

者关于中文语文学进展的著作,这些著作会影响他对自己押韵格式的理解。^①所有这些重要的决定以及理雅各自身对汉英翻译工作的理解使他认为非押韵的译文能更准确地表达原文的含义。^②

(二)绪论中特殊翻译

理雅各的绪论总能引起读者持续感兴趣的是他固定穿插相关资料的其他汉英双语译本,我们可以从中了解理雅各的翻译艺术及他为在英译本中带来更多儒家经典文学知识所做出额外努力的赞赏。这种方式沿袭到《中国经典》第四卷,其中包括特别版——一位 19 世纪法国汉学家的一篇法文英译。

接着,理雅各以附录形式呈现五部分汉英译本的取材。大体上,在正文中,它们格式相同,并以注释中的小字体格式出现在正文。这样,理雅各可以分享更多信息,而不需用更多纸张或间隔绪论本身(是《中国经典》五卷中第二长的绪论)。接下来的是这些双语译本的详细内容。

第一部分提供古代中国诗歌英文翻译的资料,不收录于《诗经》,以附录形式呈现。其中英译文在书页的上方,中文原文位于下方。^③总体上,附录包括从大范围的古代诗歌中精选的 43 首。^④大部分不是出自《左传》和《春秋》(10 首),及《大戴礼记》(6 首),就是来自《太平御览》(9 首);这些表明理雅各的选择兴趣倾向代表先秦儒家传统的主要作品。在这些译文中,有趣的是理雅各用简单的韵格式翻译了七首韵律版译文。^⑤因此,虽然看上去“(不)可能”做到,但他还是愿意在这个原则下尝试一些韵律诗的译文。

接下来是著名的“大序”与“小序”双语译文,标题采用理雅各自己的译名。“大序”篇幅略短,于是理雅各在下方添加注释其中的细节;^⑥“小序”篇幅

① 通常,在注释里,理雅各会简称“字典”,来指这部 18 世纪著名的字典,帮助他鉴别不同的发音。请看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第 105—111 页。

② 请看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 115—116 页。

③ 请看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 13—22 页。

④ 理雅各说他的原始资料是一本由清朝儒家学者沈德潜所编的《古诗源》,这部作品里面包含了 100 篇理雅各选来当做例子的诗。

⑤ 一般来说,韵律格式都在第一行,然后是第二行。因此,无论诗有多长,该诗都是遵循固有格式。其中三首诗中,三行诗押相同的韵只出现一两次,但其他的诗中,大部分的韵是在两行之间。请看诗歌第 5, 31, 35—38 和 43,分别于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 14 页,第 19—22 页。

⑥ 关于“The Great Preface”(大序)请看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 34—36 页。

较长,无注释;保留之前的格式,书页上方是英译文,下方是水平排列的中文汉字。^①“大序”与“小序”被认为是关于《诗经》最早的概述,产生于汉代,因此它们对理雅各描述这部经典著作的本质在历史与解释学上有重要的价值。

然后是一系列特别的翻译,节选自一位汉代儒教学者的早期作品,该著作据称是解释和阐述《诗经》的内容。^②理雅各用英文称之为韩婴的《韩诗外传》。^③这一本注释与之前其他作品不同,它是为了译述而非概述经文中各类诗歌的内容。理雅各随意选出其中的16节,简单地让读者了解这位著名的儒教诗歌学者是如何整理他的主题的。为什么理雅各会如此局限和随意地选择呢?对此,他直接在附录的结尾引用18世纪钦定版《四库全书》编者的评价:“韩婴引用的诗歌是阐述他的叙述方式,并没有给出他自己对诗歌含义的解释。”^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理雅各在注释里提供了其他人的批判性观点。

中英双语译文的最后章节,并不是早前出版过的经文,而是由理雅各从赵翼(1727—1814)和王韬整理的资料编集而成。^⑤文中,理雅各选择的诗歌例子目的是为了能够阐明广博的中国诗歌中不同长度的诗行和形式多样的韵律。这个与众不同的选集里的另一个原因是里面的诗都不是出自《诗经》;因此,为了读者,理雅各再次要求自己给其他中国诗提供另外的英文翻译。这里,我们能够看到激励理雅各追求汉诗美学效果的其他动力。其中另外一

^① “Little Preface”(小序)更详细,紧随“The Great Preface”(大序)之后,请看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36—81页。

^② 请看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87—95—页。

^③ 这个长标题请见注释参考书目录标题45,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178页。在绪论前部分,他则用稍短的标题,“Han Ying's Illustrations of the She”,请见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87页。在注释中,他简单地引用作者的名字。

^④ 引自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95页。

^⑤ 理雅各表明这个题目还没有被其他任何欧洲“汉学家”充分地解释过。因此,他觉得很有必要给读者说明这一点。他也坦率地说到有依赖上述两位中国学者准备的资料。请见附录名为“On the Various Forms in which Poetry has been Written among the Chinese”的第一段。以及第二次提醒“汉学家”需讨论赞美诗中的韵律及其研究。请看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117和126页。

个原因就是为了让中国基督赞美诗的未来发展而做的不断努力。^①这篇翻译文本的特点就是采用了另外一种格式:理雅各用中文呈现中国诗歌精选集,但以横排排列,每句间有空格,区分诗本身,接下来是理雅各的英译文。在理雅各给出的20篇诗中,仅有一篇韵律格式的诗由李伯(701—762)写的。^②其中两篇由于篇幅太长,所以理雅各只是给出了中文原文内容,并没有给出英文翻译。^③同样,在三个翻译示例中,理雅各采用了“平”和“仄”的传统方法来表明诗中的韵律。“平”表示平声;“仄”表示传统汉语音韵学的另外三声。^④通过采用这些方法,理雅各不仅介绍了汉诗的押韵、韵律和诗的长度,而且还为感兴趣的读者阐明了一些诗的内涵。

(三)绪论中特别的附录

除了这些介绍性的材料需要翻译成英语之外,理雅各还要想出三篇与《诗经》有关的正文。第一篇要出现在“小序”英文内容的后面,题名是“A Table of the Pieces in the She [Shi] Chronologically Arranged”。^⑤理雅各给整个《诗经》中一些诗命名和阐明细节。有时候,他也根据他们所共有的主题来编排(这可能或不可能反应一个共同的历史背景)。审查过了大量的评论性文章之后,理雅各最后的评介言论直接和312篇的诗有联系。诗中的大部分,他个人认为,不能够和当时特定的历史时代或文化背景吻合。^⑥

接下来讨论的是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附录,而是作为“古音韵”的第四和第五部分。在这引言部分里面,很大程度上理雅各说明了古代中文“尾韵”。另外,文中还增加了一些评论以前传统描写的讨论。通过对古代中原音的分析,即使是同样读音和声调的汉字也能够分成很多的子集,所以这些

① 其兴趣在于告知那些准备基督赞美诗的人,并在绪论中提到了两次。请见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114和126页。在前面部分,理雅各引用了这样一种设想:要有一位“Christian Chinese of genius”[天才的华人基督徒],此人愿意追随美学的挑战。人们就会想到理雅各将会对一位中国目录学家所编纂的历史资料由衷地感到震惊。请见 Fang—lan Hsieh 著 A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 Hymnody from its Missionary Origins to Contemporary Indigenous Productions (Lewiston: Edwin Mellen Press, 2009)。

② 整套译文与评论请看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117—126页。上述提到的那首英文韵律版诗歌出现在第122页。

③ 请看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123—125页。

④ 请看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122—123页。

⑤ 请看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82—86页。

⑥ 这个表按照时间顺序从最古老的到较新的诗来编排。

页都是能够被人辨认出来的。^①

因为最后的文章并不是由任何一位中国学者或理雅各所作,所以这篇文章很不一样。这篇文章是由 19 世纪早期一位名气较小的法国汉学家学者 Edouard Biot [毕欧] (1803—1850) 所作。即使理雅各本人先前给《诗经》的内容做过概要性的陈辞,但是他还是增加了一篇文章的英文译文。这篇文章于 1843 年由法国毕欧所作。根据儒家经文,此文描写了“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与习俗中 19 个不同特点。^② 毕欧的这部作品的原名是 *tour de force*, 所以理雅各在绪论部分放入了这篇文章的一部分英文译文以此来纪念过世的法国汉学家。

(四) 具有注释的参考书目

在《中国经典》的第三卷和第四卷中,理雅各增加了相对长点的附说明的资料目录。这是因为那两个儒家经典著作必须给他们没有讨论过的特有题目做出参考。^③ 虽然很多第四卷中参考文献的条目因为其特别的汉字而得到关注。其中有两个对理雅各来说具有特别的历史价值。第一个是利玛窦 (1552—1610) 所作的《诗经》;第二个是徐光启 (1562—1633) 所作的专题文章。理雅各花了很多的文字去描写这篇论文,并且称它为 *a more extensive Work than we might suppose* [未曾料到的丰富著作]。最后,他相信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作品。理雅各觉得这部作品非常特别的原因就是:根据 1617 年作者的一位朋友写的前言所说,我所采用到的副本作品是王韬的,文章内容和原本一模一样。^④

① 请看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 105—111 页。

② 文章的标题是“从《诗经》看古代中国礼仪的研究”。这篇文章最初是刊登在 *French academic serial, Journal Asiatique* (November/December 1843)。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再一次知道理雅各已经意识到了他与欧洲汉学传统的联系。同时,他也在发挥自己的学识努力地向欧洲汉学传统变得更加完善。请见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 142—171 页。他出版的《中国经典》一书录入了另外一部由外国人编写的仅有的文章。此文是一篇由年轻教士湛约翰 (1825—1899) 编写的有关中国天文学的文章。请见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三卷,绪论,第 90—104 页。

③ 第三卷的具有注释的参考书目,请看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三卷,绪论,第 201—208 页,包括 58 个中文标题和 10 个欧洲语言的标题。第四卷的具有注释的参考书目,位于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 172—182 页,包含 55 个新的中文标题,同时也包括一个标题下大量丛书系列的许多小标题,以及十个外国语言的标题。外语标题中有两个是拉丁语、一个法语以及七个英语。

④ 请看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 175 页。

因此,理雅各描述王韬关于《诗经》的注释著作具有很好的历史价值,是为理氏《中国经典》第四卷的撰写做特别准备的。^①在具有注释的书目录中,理雅各增加了有关这本专著的细节及指出他与王韬不同的解释立场。同时,他赞扬了这位中国同事在此专著中的成就:

任何关于《诗经》文本及其含义的资料,[王韬]都给予评价……[整本著作中参考的注释总数]多达124本。我注释的多元化与完整性主要归功于王韬的著作:文中仅有的缺陷就是过分偏爱毛茛的观点。我希望作者[王韬]为了自己的国民也能够将其作品出版。

最后,理雅各和王韬一起共事了将近10年。他们俩的合作开始于1863年,结束于理雅各离开中国的1873年。在这期间,理雅各不仅赞助了王韬的合作研究,而且还承担了他在苏格兰两年旅行的所有费用。这次旅行深深影响到了王韬的世界观。他们之间的友谊和智慧、精神上升华的故事是值得人们借鉴的。特别是在当时中国学者拥有诸多问题的年代,王韬因为政治原因被清政府流放了将近20年。在晚年的生活当中,王韬成为了19世纪晚期当代中国的一位教育家。^②

(五)长篇附录

在《中国经典》前面的其他卷册中,理雅各的同事湛约翰编写了《中国经典》第四卷的索引部分。他后来变成了著名的汉语言学家。湛约翰给出了更多的索引,这是都是为了给将来的中文古诗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材料。有趣的是,和“主题”有关的第一个索引是非常详尽且长度很长。但是,解释“正名”的第二个索引却相当的简短。^③另外,“中国短语和汉字”的索引有时也包含了语法知识和前后对照。因此,这个索引也就成为了整个《中国经典》索引中最长篇幅的部分。^④

^① 事实上,王韬至少编写了其他和《春秋》《左传》《易经》与《礼记》有关的注释书籍。这篇专著,现尚存并收藏于纽约公共图书馆内。

^② 刚开始对他们关系做最新和详尽的描述,我们能够在费乐仁编著的《王韬与理雅各布对新儒家忧患意识的回应》中找到。费乐仁著《王韬与理雅各布对新儒家忧患意识的回应》,载林启彦、黄文江主编的《王韬与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0),第117至147页,随后在原版英文中 History and Culture (Hong Kong) 2 (2001),第1—20页。

^③ “主题”的索引请看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第649—677页,是整套《中国经典》中最长的索引;“正名”的索引只有3页,请看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第678—680页。

^④ 请看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第681—785页。

(六)《诗经》正文结构

从翻译学角度考察,我们应该说理雅各在 1871 年给自己刻画了一个没有较高美学标准的直译翻译家形象。他既不把自己当做“诗人的翻译者”,也不当做翻译者的诗人。^① 我们可以从下面得知,在往后的岁月里,他的态度都改变了。他作为翻译家角色的转变并不影响《中国经典》第四卷的出版。

最初,(正如第三卷)第四卷以两本卷册得以出版。这卷也就成了《中国经典》第一版八册五本中的一部分。这里有的就是没有修改过的第二个版本。这个版本以一种全新的五册五本的方式出版。现在,还有另外一个第一和第二卷现代合订版本。这就让《四书》变成了单本。在二战后一段时间,《中国经典》以五本四册的方式出版了。

《诗经》正文总长度为 647 页(并不包括绪论或索引),英译全文都采用了这种格局,该格局的一些部分在绪论中都得到了解释和系统化。相对于其他卷册来说,第四卷更具有综合性特点。

在正文和注释中,一系列标题能够确认找到地点和诗。诗的每个部分(如国风、大雅)以及小单位“decade”「什」的诗和标题一起出现在文章当中。^② 这也就是说一首诗歌是没有直译的,仅能够在注释中找到叙述性的标题。因为大多数的标题都来自一首诗第一章的第一部言语。虽然每位读者都能够发现标题中文字的含义,但是为每首诗决定一个更具文学性的标题,这种间接方法并不适合。

在描述性标题出现在注释之前,理雅各通常把一个术语或短语包含在所有诗和相关评论当中。根据传统标准和自己的研究,单个术语或短语就表示诗的分类。三个基本的类别分别是“叙述式”、^③“暗指式”^④和“隐喻式”。^⑤但是,在某些诗中(通常是那些较长的诗),需要的基本元素涉及到两或三种类

① 请参考 David Connolly 著“Poetry translation”,在文章结尾他谈到“poet—translators” and “translator—poets”第 175—176 页。

② 尽管“decade”在《诗经》中作为术语,事实上,很多时候,有的节都超过 10 首诗的限制。

③ 请见“Ode 3. Narrative”评论第一行,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第 76 页。大量的诗篇属于这一类别。

④ 请见“Ode 5. Allusive”评论第一行,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第 253 页。

⑤ 请见一个有名的例子《“Ode 10. Metaphorical”》中,评论第一行,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第 297 页。这首诗让理雅各很头疼,因为他不清楚该如何用“逐字翻译”把诗中的暗指部分翻译出来。详情请见随后的正文。

型的结合。^①理雅各认为很有责任去说明那首诗的复杂风格。

即使理雅各试图去批判与汉代毛氏有关的传统和文本中很多方面,但是他大体上仍采用毛氏编排的诗节区分诗篇。

像《中国经典》前面其他卷册一样,卷册正文中每页都包含三部分:在页首关于近代清朝中文文本的详述,在页中是理雅各的直译内容以及在页尾的评论性注脚。通常来说,评论性注脚都是相对受到限制的。这些注脚在《中国经典》第四卷中都仅包含每页三分之一的内容(以及很不像第三卷里面的评论性卷册)。有知识的读者就会注意到标准中文版本和英文译本都增加了一些现代内容。主要增加的内容就是一系列的数字。这些数字能够识别参考题写中的诗和诗部分内容。在中文标准文本当中,数字都是罗马数字。这些数字都是为了辨识章节、书目和诗歌的顺序。阿拉伯数字则被用来标明诗和行的顺序。

正文更加具有争论性之一就是理雅各翻译的“字面的非韵律形式译本”。之前,注意到了这点,这个事实就应该得到关注,即使是理雅各并不打算翻译一本真实的韵律英文译本。然而,他根据传统诗节的格式编排了所有的诗。虽然理雅各一直说明为什么创作一部忠实且有韵律版本的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理雅各却面对一系列严峻的评判。这些评判都是那些坚持声称他们不能够从这些古典中文诗中感受到的韵味。

在每页底部的注释中,在评论中每部分的开始都作为整体描述了每大篇与每「什」节的内容。除了这个,重点主要在诗的细节上面。其中,各个诗描述性命名和分类之后,都有独特术语的细节、不可译的部分内容以及不同寻常的术语或短语。通常,这些都是在包含了直译和中文汉字的双语文本当中。有时候,在其他评论中的段落被转用到了理雅各自己的注释当中。历史性和语法方面的脚注常常与诗的内容密切相关。所有主要评论的评介都出现在了主要声明部分。在诗的结尾部分,诗中总有一个押韵方案的概述。这个概述都是在绪论中和古音的讨论、古代韵律的类别有关。

理雅各将“科学观”放入了他的注释当中。通过这样,他希望能够提高英译直译的水平。正是这种科学观念,他才开始通过它们的学名辨识所有植

^① 大多数是“Allusive and Narrative”或“Narrative and Allusive”的结合,请看这些诗的第一行,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第27页和第616页。关于这三种类别出现在同一诗行的例子,请看“Ode 10. Metaphorical, allusive and narrative”那首诗第一行,见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第55页。

物、动物和其他生物(其中不包括人类)。他不仅向英国—中华药学专家请教,而且也从居住在中国、日本的一些传教士学者和科学家那里听取建议。每当有一个术语出现在一首诗的诗节当中时,拉丁术语也会不太合适地出现在英文译本中。虽然这样,但这种方法还是很少被采用,并且通常也没有冒犯读者。^①除了很长的多音节拉丁或希腊名字,理雅各发现了一种更加间接的方法来引用这些术语。

(七)《诗经》的评论性来源

虽然王韬所创作的专题论文当中理雅各采用了 124 位儒家评论家的作品,^②但在这一卷注释中有的中国评论家还是占主要地位(《中国经典》第四卷之前的三卷就都有一样的情况,《诗经》注释中五位关键性的人物成了重点)。值得重视的是理雅各的文本采用了 Robert Morrison(马礼逊 1783—1834)字典中所介绍的拼音系统,但是该字典不再被汉学家或其他人所采用。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采用这种形式来引用这些内容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从汉代开始,有两位受人尊敬的人物经常出现:Maou [毛萇] 和 Ch'ing [郑玄或郑康成 (127—200)]。虽然引用自 Sze—ma Ts'ên [司马迁(约前 145—约前 86)] 和 Hân Ying [韩婴(约前 200—约前 130)] 的内容都是相互关联的,但是他们被引用的次数远远少于毛萇与郑玄。唐代有一位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是 K'ung Ying—tah [孔颖达(574—648)]。在宋代儒家学者当中,理雅各对 Choo He [朱熹(1130—1200)] 的评论最感兴趣,同样,他也从 13 世纪《诗经》研究中引用了另外一位学者的评论。这位学者通常都要找些理由来反对朱熹的说法。他的名字就是 Yen Ts'an (严粲)。理雅各对这个人的作品持有相当高的评价。不仅如此,而且在称赞这位学者的同时,理雅各体现了自己作评论的偏好。^③

总体上,严粲同意 Leu Tsoo—k'een [吕祖谦(1137—1181)] 的结论;他对前人的解释著作很熟悉。当严粲觉得有必要指出的时候,就不怕说出自己特有的想法。在所有宋朝的《诗经》评论者中,我[理雅各]把 Yen Ts'

① 这些术语书目庞大,但理雅各认为有责任给每个术语尽量提供可理解的解释,从而让诗歌尽可能地做到字面上精确理解。例如,在正文的前 100 页,有 29 类植物、动物、花及其他品种。其中,理雅各把 *tribulus terrestris* 全名放入注释中,还在那首诗的第二、第三诗节中用“*tribulus*”这个术语。后来有些人批评这类“科学术语”破坏了诗歌本身的特点,而不是促进它的表达。该例子请见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第 74—75 页。

② 明确的描述请见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 176 页,标题 20。

③ 见注释参考书目录标题 11,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 174 页。

an 仅次于 Choo He, 排第二位。

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Gow—yang Sëw”欧阳修(1007—1072)的名字经常出现在理雅各注脚里面。但是,根据正文页尾中所引用的次数,欧阳修没有宋代两位学者突出。

儒家评论家中,理雅各非常注重的清代学者在那之前还没有在汉文学领域受到外界应有的关注和褒奖,这件事情让人们感到很震惊。比如:“Keang Ping—chang”姜炳璋(活跃于 18 世纪)的作品《诗序广义》二十四卷(The She [Shi] and the Preface to it Fully Discussed in 24 Chapters)。理雅各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也就说明了为什么理雅各引用它很多处地方。^①

这本著作是清代最重要的《诗经》注释……虽然经常与朱熹持相反的态度,但是他很快认识到朱熹的优点,相比毛氏,则更偏爱采用朱熹的解释立场。整部作品都是真实的;当然并不是没有错误和偏见,但是他值得具有毛氏、朱熹和严粲同样的学术地位。

除了引用姜炳璋的作品内容之外,我们也都能够看到朴学流派两位清代学者的作品:一位是江永,另外一位是王引之。第一位在理雅各研究《论语》的时候就很杰出,但是由于他对古代诗学名著只是选择性地做了一下研究,所以就只是引用到了这里。相反,他常常引用第二位学者的内容。这是因为他的作品揭示了古代语法的重要特点。^② 在参考文献中,著作引用到的内容都包含了翻译的材料。这些材料的内容包含了很广的范围领域。^③

从这些所有的脚注和材料来看,在《诗经》中我们能够了解理雅各翻译的基本立场。理雅各深深被宋代学者朱熹的道德情操所吸引。同时,理雅各也对朱熹睿智的解释完全欣然接受。尽管如此,在朱熹语言研究方面,理雅各仍会意识到对他不公正的言论和限制。因此,理雅各对早期被认为是标准的毛诗序提出了质疑。理雅各也相信汉代的学识和来自清代儒家学者为了挑战那些传统而提出的一些指正性言论。

丁、《中国经典》第四卷翻译中的问题

① 之前的细节与引用请见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 175 页,注释第 19。下面出现的引文摘自原文。

② 理雅各关于古代韵的注释请见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 180 页,注释第 55。

③ 请看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绪论,第 178 页,注释第 32 中 viii。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理雅各此著作在三个研究领域没有突破。有时,这是他自己解释文学的方法,有时是因为理雅各并没有意识到并且也没有被告知这些材料。要知道这些材料原来是解释的重要材料。然而,这些都是在他发表了他的作品之后才被证实的。

其中一个领域就是汉语语言学研究,特别是理解术语词源来历、隐喻和古代诗歌韵律分类。理雅各采用了18世纪《康熙字典》文献分类的大体框架。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19世纪中国学者的研究就使用了更早的汉代作品《说文解字》。这个给后世作品有关语言学的设想和缺乏一致性提出了挑战。曾经没有一位非亚裔外国学者全面地研究近代汉语语言学。在理雅各发表《诗经》十年多之后,他的同事湛约翰(1825—1899)发表了有关汉语语言学研究的探索文章。这些研究对18世纪皇室标准记录提出了挑战。^①在他以前以及这个领域研究的时候,湛在他1882年发表的很多文章中都宣扬要了解中国语言和诗。

第二点,理雅各没有意识到在考古挖掘中发现的古人骨头上刻字和工艺品上汉字的重要性。这些都成了20世纪早期汉语语言学研究的曙光。这里,我们并不能够责怪理雅各。但是,我们应该能够想到他们通过这些资料去理解《诗经》中难懂的汉字。^②

最后,至于理雅各翻译儒家经典所有的诗,我们应该给他提出挑战。我们应该问:所有诗的隐喻会改变直译内容的意思吗?或者这些诗让这些隐喻无法在《诗经》解释设想中成型。有这么一首诗。因为这是一篇理雅各彻底修改过的诗。

这里“彻底修改”的意思应该很清楚了。显而易见,当理雅各同他两个侄

^① 理雅各的同事湛约翰,为每卷准备中国汉字和短语列表与索引,因此在进一步研究古代语文学研究之前,他已经成为最初的当代中文语言学家(尤其在广东话方面)。他在此领域的突出贡献是出了一本反映《说文解字》的现代学研究的意义的书,于19世纪在中国出版,成功地阐释了古代中国汉子以及他们的发音并不全部和《康熙字典》里编纂的一致。他最初的发现在1882年于苏格兰出版,名为 *An Account of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under 300 Primary Forms: After the Shwuh—wan[说文]*, 100 A. D., and the *Phonetic Shwuh—wen*, 1833, 请参看费乐仁著“Forgotten Treasures: Two Missionary—Scholars’ Contributions to Stud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 John Chalmers (1825—1899) and Léon Wieger (1856—1933), *The Korean Journal of Chinese Characters* 1 (December 2009), 第77—110页。

^② 请参考陈致《说「夏」与「雅」:宗周礼乐形成与变迁的民族音乐学考察》,载《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1年9月(第十九期),第1—54页。